



〔社会观察〕

# 消费的第四时代

□肖复兴

近读一则文章,介绍日本学者三浦展的学术著作《第四消费时代》。根据三浦展的论述,将日本的消费分为这样四个时代:第一消费时代,1912年到1941年,即二战之前,其宗旨是追求现代化初始之时带来的摩登物品;第二消费时代,1945年到1974年,即二战之后到石油危机之时,其宗旨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追求大而全的物品,比如大冰箱、大彩电等;第三消费时代,1975年到2004年,其标志是追求个性化,标新立异,向往名牌;第四消费时代,预计从2005年到2034年,其标志是不再抛撒金钱追求所谓个性,攀比名牌,而是愿意拿钱买体验,换取美好幸福的时间。

除第四消费时代,三浦展对其语焉不详,所言有些虚空之外,前三个时代和我国情形十分相似,只是从时间段看,似乎我国要推后十年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当然,这和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相关联。大致来说,我国的第一消费时代,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后的事情;第二消费时代,应该是经过漫长岁月之后,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代;第三消费时代,则应该是近二十年后的事情,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,感同身受得最为深切。

如果按照我的理解,将这三个消费时代重新命名的话,第一消费时代是实用时代;第二消费时代是占有时代;第三消费时代是时尚时代。在这个消费时代里,名牌和车、房,成为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消费最重要而醒目的标志。只要想想以前结婚要求自行车、手表、收音机三大件,后来结婚要求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这新三大件,再看看如今结婚的新标准:有车有房,父母双亡(当然是颇具调侃和讽刺意味的),便可以看出,第三消费时代确实是以这样的标准,塑造着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价值取向。

消费时代的进展变化,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开放,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念的更新和价值系统的变动。消费的变化,不过是最外浅层,最容易看得见的变化,如同四季物候的变化最为显著。

同时,这种消费的变化,也体现着不同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,乃至对精神追求的一种物化后的折射。当然,这种追求,因其表现在消费上,容易染上商品的色彩而易于流俗。说好听一点,是理想;说不好听一点,是欲望。在第三消费时代里,欲望和理想已经雅俗共赏地紧密结合在一起,而不会让人们那样反感了。

有意思的是,正在向我们走来的第四消费时代,究竟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和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,并塑造我们新的消费观念、价值取向乃至精神和理想?真的会如三浦展勾勒的那样,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感

情连接,才是比追求物质更大、更重要的“幸福美好的时间”吗?真的会让人们潜藏于心、表象于消费的欲望减弱一些,让理想增强一些吗?

据说,2017年3月,东日本大地震六年之后,东京银座中心矗立起一则巨幅广告,警醒人们,地震时海啸掀起的冲天巨浪高达16.7米,正好是银座中心的这个高度。这个高度被标出红线,醒目地刻印在银座中心的大厦上。它提醒人们,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,忘记曾经触目惊心的灾难。它提醒人们,经历过风雨之后,是否可以重见彩虹,要看你是否真正认识到,面对灾难中逝去的挚爱亲朋的生命和瞬间坍塌的再贵重,再豪华的物质,什么才是最为珍贵的?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和美好?

我们现在同样也在经历着一场灾难,疫情在全球蔓延,我们必须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。仅仅从消费而言,锁户闭门这么多日子,消费变得比较单一,以往常见的人如蚁动的旅游壮观,更只是在回忆中和照片里。如今,疫情趋势向好,不少人开始梦想着能够重新进入商场和饭店或名山胜水,去尽情购物,去大快朵颐,去四处游览,将在疫情期间被冻结、抑制的消费,大幅度地、偿还性地甚至是报复性地释放出来,发泄出来。

当灾难终于可以过去之后,是否就是我们的第四消费时代?在第四消费时代里,我们会不会变得聪明一些?变得有节制一些?变得长记性一些?真的会如三浦展所说的那样,或者,比三浦展说得更进一步,让我们认清一些客观世界,认清一些强悍世界之中我们渺小的生命,以及我们自己的内心?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,哪怕是在再世俗的世界里,物质可以是让人最幸福的吗?还是亲情是让人最幸福的?是“不惜千金买宝刀,貂裘换酒也堪豪”,还是人与人亲密在一起的空间和时间,是一种应该渴望的幸福?是“曾因醉酒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”,是我们左牵黄右擎苍双双拥在怀中的欲望,还是生命的存在尤其是一家老小能够欢聚一堂,绿水青山常在,旧友亲朋常在,才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渴求?

当这场席卷全球的灾难彻底过去,不知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矗立起一座纪念碑,纪念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亡灵,纪念为拯救灾难中的人民而奋不顾身的医护人员、社区人员、警察、军人、义工、司机、清洁工、快递小哥等等那些难忘而英勇的普通人,或者,也像银座中心一样,刻下一道醒目的标志,让它提醒我们,进入所谓的第四消费时代,不要再像以往对物质那样贪婪,对世界那样攫取,对他人那样以邻为壑,对大自然那样无所畏惧,对我们自己那样缺乏自省、反思和忏悔。

那样的话,第四消费时代,便不仅仅是消费时代,而是一个新的时代。

□白锋

去水泊梁山旅游,会感到很失望,那丁点儿地方,大郎开几家烧饼铺是足够用了,但无论如何也演绎不出江湖好汉啸聚山林,大败童贯、高俅那种大阵仗的气势。

虽然《水浒传》是小说,但也确有实事作支持,水泊梁山在历史上也确曾是大片的水域。

近年来自媒体发达,曾经读到过一篇微信文章,说北宋仁宗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帝,在他的任内有庆历新政,仁宗也优待文臣,从善如流,甚至还有点怕包大人,历数其诸般好处。虽然文章所述也是事实,但只能说是一个侧面,对仁宗皇帝的作为仍然是个误解。大宋的政策的确优待文臣,宋仁宗从性格上来讲可能不强势,但却未必从善如流,从史实上看甚至很任性,这是权力的性质决定的。应该说,北宋最后的覆亡,和他有很大的干系。北宋覆亡是1127年的事,是他死后半个多世纪的事,怎么他会有责任呢?他还真有责任,主要问题在于他的狂妄自大,不听劝阻,试图为黄河改道。

黄河是泥沙含量极大的河流,随着季节变化,水量枯荣,进入河南以后,泥沙沉积,河床越来越高,形成地上河。河床增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改道,所以黄河的入海口并不稳定,在南北之间摇摆。从历代黄河改道的情形看,北宋之前最大的一次黄灾是在王莽时期,黄河于河北大名附近决口,经治理后,东汉故道一直是从天津附近入海,黄河经历了近千年的大致稳定。北宋之前的后周,有过小规模决口,这是最初形成水泊梁山的原因,但水面面积并不很大。对于梁山泊的来历,最早见于《资治通鉴》:“显德六年(公元954年)浚五丈渠,东过曹济、梁山泊,以通青郛之漕。”这是最早记载梁山泊的史籍资料,在《资治通鉴》前,史书对梁山泊的称呼是没有的。但这个时候梁山泊的水仍不是很大,远不到后来所说的八百里水泊的那个气势。

北宋的都城在东京汴梁,就是今日之开封。黄河从城北浩荡东去,犹如一条天然的护城河,北方辽国虽有骑兵之利,但黄河却很容易将其挡住。

北宋初期,黄河有小规模的决口。宋真宗时代有臣子上书提出要给黄河改道,这个人东昌府人李垂,他的上书叫做《导河形胜书》。他认为黄河有很大的改变路线的趋势,如让黄河自由发展,几年后它就会流入辽国,这样辽国就可以沿着黄河南下,首都汴梁就有危险了。

当时的辽国和北宋之间的界河是河北的白沟,其实就算黄河尾际延伸到辽国境内,辽国要想溯河而上对大宋不利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李垂想出了“把黄河改回旧道”的主意,不让黄河北流,而改为利用六塔河之旧河道令黄河一路向东,流归大海。宋真宗动了动心,但是没敢干。真宗死后,那个备受推崇的仁宗赵祯继位,此人在位40年,他在位时的中期,庆历八年(1048年),黄河又一次决口,冲决澶州商胡埽,向北直奔大名,经聊城西至今河北青县境与卫河相合,然后入海。这条河,宋人称为“北流”。12年后,黄河在商胡埽下游今南乐西度决口,分流经今朝城、馆陶、乐陵、无棣入海,

〔历史溯源〕

# 水泊梁山的水

宋人称此河为“东流”。

宋仁宗“从善如流”,决计实施黄河改道这个计划。欧阳修看出这个计划是在作死,极力劝阻。欧阳修虽不是水利专家,但他的观点很朴素:黄河开封段河面宽200步,六塔河才多少?50步!“欲以五十步之狭,容大河之水,此可笑者”。负责具体实施的河北转运使,也是一个山东人,系益都人周沆,他上书说:“全河东注,必横溃泛滥,齐、博、德、棣、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。”周沆提醒仁宗“此五州者,素号富饶,河北一路财用所仰”,千万不能这么轻易就决定此事。但是仁宗不听,从地图上比划着,觉着这事儿行。

于是,这项巨大的工程没有论证清楚就仓促上马了。1056年,仁宗命人塞商胡北流,使黄河入六塔河,然不能容,是夕决堤,溺兵夫、漂台藁不可胜计。这次六塔河决堤直接冲废半个河北。河北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定州路,仁宗年间兵额十万,六塔之役放完大水,神宗重造兵籍后只有兵额两三万了。

仅4年后,公元1060年,黄河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决口,史称“大名决口”。这次决口的后果是,黄河一分为二,形成北流和东流两股,即所谓的“二股河”入海。

仁宗死后,宋神宗在王安石的怂恿下搞回河工程,王安石的计划是:堵塞北流,稳定东流。也就是把“二股河”变成一股。有权就是任性,谁都知道黄河改道是因为泥沙淤积、河床抬高所致,水往低处流,现在想恢复黄河故道已经不可能。司马光极力反对,但宋神宗非要试试看,试图让黄河回到东汉故道,结果这次直接导致黄河夺淮入海,凡灌郡县四十五,而濮、齐、郛、徐尤甚,坏田逾三十万顷。

这次曹村决堤一口气冲掉了三十万顷田地不说,还直接玩坏了黄河的下游水系,黄河开始乱流。梁山泊成为大片泽国,应该就是这时候开始的。据说今日之东平湖即属梁山泊之一部。

这一年,苏轼从密州任上转知徐州,恰好路过济南,就顺便来看望在济南任职的弟弟苏辙,结果苏辙回京城述职去了,也没见上。不过,苏轼在济南玩得还算开心,在济南游玩一通之后就去徐州赴任。刚到徐州,就赶上这场大水,差点喂了鱼鳖。气得苏轼大骂此决策昏庸。有史书记载说:徐州城外水深一丈。不过那时候的度量衡和今日有所不同,《水浒传》提到各色人物经常说身长八尺什么的,还有个一丈青扈三娘,总不能一米多高吧,一米8也许会有。

此后又经几次折腾,最终到北宋末年,河北这个北部边防前线,兵员只有几千人了。当然大宋朝廷有过指示,让河北多种树,再就是多种水稻,种庄稼也必得东西垄,不能南北垄,试图以此阻挡北方的骑兵。这要是夏天也许还管点用,可是冬天呢?

1127年,金兵南下,如入无人之境,大过年的,兵临汴梁城下,能说仁宗没责任吗?

